

浅论反常态下的“陶渊明”

谷 舒 (湘潭大学 411100)

摘要：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成为诗歌创作中反常态下的一朵奇葩。其与当时魏晋士人不一样的“小人”和“君子”等生活反常观念及创作中的反常态使他成为我国田园诗派的代表和奠基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反常态；创作；陶渊明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课题《陶渊明与魏晋江南地域文化》(10C1297)的阶段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透露出新的生机，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如陶渊明的“天然去雕饰”，就别开生面，成就了我国田园诗歌的辉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千百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一并成为后世诗人与读者崇拜和研究的对象。所以，深入研究陶渊明当时一反常态的思想、心态及创作，对于研究当时极为复杂的面临着节义、出处、生死等多方面抉择的魏晋士人心态和行为，很有必要。

一、生活中的反常观

陶渊明与当时魏晋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并超然于主流文化，深受后世推崇，虽有诗学和文化的原因，但和陶渊明一反常态，独特创新，是分不开的。

1. “小人”和“君子”对立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其祖父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而陶在安帝义熙元年(405)，任彭泽县令，因品格卑鄙，德行低下的“督邮”式乡里小人而卸甲归田。在《桃花源记》里则批判了“渔夫”式的“乡里小人”。而对普

通老百姓即真正的乡里小人，却与之交朋友，共话桑麻。而其青年时“猛志逸四海”的大丈夫形象及彭泽辞归后“忧道不忧贫”的“贫士”形象构成了他“君子”思想的内核。这些都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2. 劳动与隐士相伴

陶与虚谈废言浮夸空谈的玄学家不同，做县吏时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脚踏实地，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披草共往来”，使陶渊明这位卸职的县太爷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或在田间或在地头，或在家中场院，“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彼此心心相印。与传统的隐逸方式不同，陶渊明是去游览，在隐逸游玩中追求自己幽静冲淡的抱负；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邻曲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那种与邻居一起谈史论文的直率交往，跃然纸上，扑面而来。与当时士大夫、隐士不同，陶渊明不仅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旷古以来，陶渊明是第一位。

3. 苦难中的逍遥与困苦中的豁达交融

陶渊明归隐不久，家遭火灾，移住南村。后来家境穷困，连僮仆都雇用不起，逼他只能以躬耕务农谋生。“击壤以自欢”的感受是在艰苦的劳动中才体会到的。后来陶渊明的生活十分拮据，喝酒都要靠朋友赠送。晚年贫病交加，“偃臣瘠馁有日羹”，饿饭数落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气自凋”（《己酉岁九月九日》），隐含着十分悲凉的情感；“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咏贫士》），融注着他凄清、绝望的情怀；“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咏贫士》），抒发

吴窑在混沌做法的不同：“首先是包法，吴窑那边的馄饨是包成一个小团儿，这儿却都带着边褶儿，夹在筷上像只蝴蝶。其次是汤更鲜，存扣专门站起来到热气蒸腾的灶上去看，看到馄饨锅的旁边咕咕地煮着一镬高汤，上面漂着拍扁了的生姜，打成结的老葱，里面还有一只整鸡。乖乖，原来是鸡汤。不像吴窑那边汤是就着馄饨锅舀的，碗里撮些虾糠起鲜。”语言生动细致，极具方言色彩。除此以外，里下河人的“澡堂”文化、女孩的各式节日发式、特有的婚嫁与春节习俗等都成为了作家展现地域色彩的内容。一幅幅里下河民风图景，饶实有趣，里下河作家们对乡土风情的热爱，对地域文化的探索欲跃然纸上。

(三) “里下河文学流派” 继承发展了扬州文化

民俗极具地域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它除了需要岁月积淀与打磨下的代代相传，内化为习惯，可以通过文学形式予以展示和保存。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更侧重于历史人文环境因素，里下河地域的文化孕育了“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一个特定的流派和作家群，同时作家们通过作品反馈出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又完好保存并继承发展了当地文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循环的过程。因此，无论是里下河的水文化铸就的“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亦或是里下河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特有的民间文化形态都成为了里下河作家们作品的表达主体，也成为了他们意欲保存的民族文化因子。

里下河作家作品中的人们是地处边缘的小人物，从事着最平凡的职业，大多生活贫苦但展现出了生活的韧性，他们安贫乐道、苦中作乐、闲适淡然的生活态度诠释了美好的人性和健美的人情，他们敢爱敢恨，尤其是那些如水一般清纯而阴柔的女子甚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爱情。这些小人物虽“小”，却代表着里下河人的文化品格：坚韧、朴实、从容。世人从作品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中提取了充满地域色彩的文化精髓，一方面促进了扬

州人对自我品格的诠释与整合，并以此为标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成为了最好的宣传方式，展现了扬州文化风貌与人文精神，促进了扬州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结语

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出现能为一个地区带来时代的文明高度和文化影响力，地域不仅是作家们各自的起点，更是他们的“文学故乡”。扬州的地理特点、水乡特色铸就了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自然风态、人文风情，滋养了“里下河文学流派”，扬州的地域文化不仅在里下河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体现，他们还用笔触展开了乡土印象和想象。里下河作家们能够从传统乡土视点追忆民俗，又从现代城市观点反思入城的农民，考察中国乡土深层结构的变迁和农民的精神趋向，写出了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里下河作家们以他们对家乡独特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美丽的里下河风俗画卷，表现了他们深厚的乡土情结，同时作家的创作又丰富、提升了扬州文化，让扬州文化呈现出了更多的当代元素。

参考文献：

-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
- [2]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总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3.
- [3]陆建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59.
- [4]朱亚.汪曾祺文学作品中的高邮地域文化[J].文教资料,2013,(24).
- [5]苏保华.扬州文学镜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
- [6]陈昭明.汪曾祺的高邮风俗画小说[J].江西社会科学,2004(10).
- [7]顾坚.元红[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8]孙玉珍.论当代里下河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大众文艺 · 文艺评论 ·

出他孤寂无依的苦闷等。最终在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陶在穷困潦倒的岁月中走完了自己一生,终年六十三岁。

但陶渊明仍“安贫乐道”,怡然自乐,说自己性本爱丘山。“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陶渊明归隐之后,在隐逸游玩中追求自己幽静冲淡的抱负,耕田、采菊、交游,成为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经常游乐于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也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最高兴的是“邻曲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父老杂乱言,觴酌失行次”(见《饮酒二十首·十四》)。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陶渊明即便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中仍然“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处处体现了他热爱田园生活,与农民交朋友,共话桑麻的思想。

他喜好游览、观赏山水,徜徉于山水之间以至不知“今是何世”,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虽夹杂着“及时行乐”和的感伤及无奈的情调,带有昏暗晦涩的色彩,但他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即使他的这类诗歌有了新的面貌。

4. 儒道并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打破了儒家一统局面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即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纵观陶渊明的作品,佛道并存,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出身仕宦家庭,“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他熟谙儒家学说,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他的“安贫乐道”思想、他的君子小人观,都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同时,他的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

陶渊明也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面对着当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的社会思潮,陶渊明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发掘出诗意,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形成了自然独特的艺术特色,如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二、创作中的反常态

陶渊明的独特,还体现在他创作中的一反常态。

1. 创作内容的反常法

陶渊明于当时的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外开创了田园诗这一中国文学的新体裁,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数量也最多。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他的诗,或将日常事物诗化,如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等等,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或将日常生活诗化,如春游、登高、酌酒、读书、与朋友谈心、与家人团聚、盥濯檐下、采菊东篱、开荒南野等等,都为诗歌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一反玄言诗的语言枯燥,内容玄虚。

2. 审美境界的反常态

在《桃花源记》里,陶笔下的田园净土平静安适、安居乐业、淳朴自然,让人心驰神往,达到了一种“率真自然”为主旨的和谐审美境界。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轻松的,其身心是愉悦的,如《扇上画赞》中说:“寄心清尚,悠然自娱。”这种以“质而有趣灵”“山水以形媚道”为核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

审美观念,挣脱了儒家“君子比德”的功利性审美观的羁绊,具有超功利主义的色彩,为后人多所称道,谓之“天然去雕饰”。

3. 创作方法的反常化

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又以理统摄融入身心,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结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情景、事、理的浑融、冲淡自然的文风。陶诗清新自然,真情真意,其人格如“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而光彩照人,其诗也达到“人妙”的程度。如《归园田居》第五首“种豆南山下”,真实再现了诗人晨起耕锄,夜晚踏上归途,扛着锄头披一身洁白月光,走在一条狭长长满草木的小道上,露水打湿了衣裳那美妙的情境和诗人真切的感。

在《养一斋诗话》中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确是中肯。“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等诗既言浅意深,又富有启发性。陶诗中的“理”是在生活中亲身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既有情趣又有理趣,言有尽而意无,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

4. 创作风格的反常性

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的是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以至于他没有得到当时高度的评价。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尽得魏晋风流精髓,又独具一格,成为魏晋诗歌一个新的高峰。陶诗中都是用朴朴素素的白描手法写实,如“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种豆南山下”“青松在东园”“春秋多佳日”,写的都是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等日常生活及事物,明白如话。正如元好问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

三、陶渊明反常态下的原因

1. 人生经历和生活氛围的影响

战乱和分裂,是魏晋时期的特征。加上玄学的影响、隐逸之风的兴盛,看透官场黑暗,宁死也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久游恋所生”“复得返自然”,辞官归隐居于田间,纵情山水。辞彭泽令,使他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出了选择,成为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从创作内容、风格、语言等方面追求“真及自然”的艺术化人生,成为魏晋风流的代表。

2. 恬淡高洁情操的影响

陶渊明不满士族地主统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陶渊明也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后世许多文人如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推崇陶诗,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归隐后,陶渊明躬耕于田园,将日常生活诗化,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成就巨大,影响了后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他们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3]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4]谷舒.从“乡里小人”视野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J].湘潭大学学报(CSSCI核心期刊),2008(4).
- [5]范文静.旅游体验理论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旅游[D].辽宁师范大学,2012.
- [6]陈靖.陶渊明美学思想在现代农业旅游景观规划中的应用[J].艺术理论,2009.